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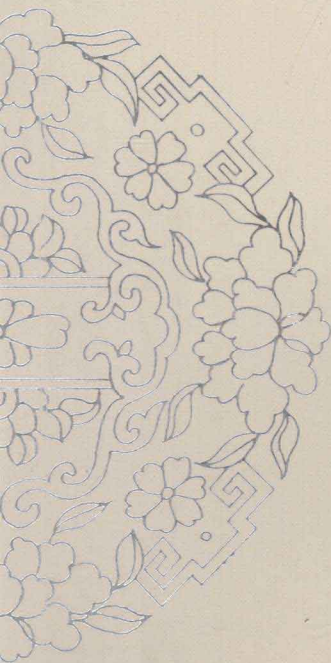
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

获奖论文汇编

全国台湾研究会

周志怀 主编

2010卷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

获奖论文汇编

全国台湾研究会

周志怀 主编

2010卷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论文汇编. 2010 卷/周志怀主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108 - 1117 - 3

I. ①台… II. ①周… III. ①台湾问题 - 文集
IV. ①D61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4269 号

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论文汇编 (2010 卷)

作 者	周志怀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 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 - 7 - 5108 - 1117 - 3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2010 年度台湾研究优秀论文评奖结果，于 2011 年 7 月在北京揭晓。经评奖委员会委员对申报成果进行匿名评审并投票，评出 2010 年度台湾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4 篇，三等奖 17 篇。

本次评奖委员会委员由北京大学教授饶戈平、厦门大学教授刘国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剑、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能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冠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局长黄文涛和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员周志怀等人组成。

经公示，以下论文荣获 2010 年度台湾研究优秀论文奖：

一等奖：

张 华 《1996 年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经济投票行为研究》

二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俞新天 《两岸关系中的文化认识问题》

周叶中 祝 捷 《两岸治理：一个形成中的结构》

李 秘 《两岸政治关系初探：政府继承的视角》

彭 莉 《论 ECFA 框架下两岸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

三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林 劲 《民进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分析》

李祖基 《论雍正年间台湾“番”地开垦政策的变化—以 [巡台录] 为中心》

郑振清 《“本土化”与当代台湾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进程》

段小梅 《两岸电子产品产业内贸易与产业分工》

童立群 《对外援助与两岸合作：现状与前景》

朱松岭 许崇德 易赛键 《“法理台独”理论根源之批判》

张文生 《两岸政治互信与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

李 鹏 《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深化》

潘 雨 《关于民进党“台独”转型的研究—基于该党群体思维的社

会学考察》

刘 舸 张三南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概念分析》

刘小年 《台湾政治走向的结构分析》

褚静涛 《台湾地位的国际法依据》

袁方成 王继琴 《基层治理中的农村生态发展：两岸改革与转型的
比较分析》

周典恩 《官府、通事与游民：清代台湾番汉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陈先才 林立辉 《民间组织与台湾公民文化变迁的关系初探》

陈小冲 《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

盛九元 《台湾都市化发展的经验与缺陷》

全国台湾研究会

目 录

1996 年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经济投票行为研究

.....	张 华 (1)
两岸关系中的文化认识问题	俞新天 (14)
两岸治理：一个形成中的结构	周叶中 祝 捷 (26)
两岸政治关系初探：政府继承的视角	李 秘 (43)
论 ECFA 框架下两岸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	彭 莉 (51)
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深化	李 鹏 (66)
两岸政治互信与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	张文生 (76)
“法理台独”理论根源之批判	朱松岭 许崇德 易赛键 (88)
台湾地位的国际法依据	褚静涛 (102)
“本土化”与当代台湾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进程	郑振清 (114)
台湾政治走向的结构分析	刘小年 (131)
民进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分析	林 劲 (141)
关于民进党“台独”转型的研究	
——基于该党群体思维的社会学考察	潘 雨 (153)
民间组织与台湾公民文化变迁的关系初探	陈先才 林立辉 (163)
两岸电子产品产业内贸易与产业分工	段小梅 (177)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概念分析	刘 舸 张三南 (190)
台湾都市化发展的经验与缺陷	盛九元 (200)

基层治理中的农村生态发展：两岸改革与转型的比较分析

.....	袁方成 王继琴 (210)
对外援助与两岸合作：现状与前景	童立群 (221)
论雍正年间台湾“番”地开垦政策的变化	
——以《巡台录》为中心	李祖基 (231)
官府、通事与游民：清代台湾番汉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周典恩 (247)
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	陈小冲 (256)

1996 年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中的经济投票行为研究

张 华

一、经济投票 (economic voting) 理论

一般认为,选民的投票偏好受到选举前后选民所处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选民在选择执政党或领导人时,会将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表现作为投票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当选民认为执政者过去的表现和行为较差,目前经济状况变坏,或对未来经济评估较为悲观时,往往会将选票投给在野党,反之则将选票投给执政党,这一现象被称为经济投票。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是 Lewis - Beck,他针对西方国家的选举研究指出,当选民肯定(不肯定)过去的经济表现时,他们便会投票支持(不支持)执政党。^[1]在全球化时代中,选民偏好愈来愈受与候选人或政党相关的本国经济表现,包括人均 GDP 增长率,贸易依存度,对外直接投资(FDI)和保护贸易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即选民依据这类经济表现信息来确定偏好从而与选择候选人相联系。^[2]

除了把执政党经济表现的评价作为投票行为的依据外,选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评估也是影响投票行为的重要经济因素,同样属于经济投票理论的重要方面。从时间向度分析,当选民根据政府过去的施政表现进行投票时,称之为回顾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如根据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投票,则称之为展望性投票(prospective voting)。由于选民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和预估大部分建立在候选人的竞选政见方面,因此又有学者将竞选政见对选民投票的影响视为选民展望性投票的重要表现之一,并将展望性投票称为议题投票(issue voting),或竞选政见投票。这两种类型的投票取向都可以看做是一个反映选民政治态度、进而影响其投票抉择的政治温度计。

从评价或评估范围向度分析,选民评价和评估经济情况时如以个人经济

情况为投票依据，则属于个人向度投票，学术界称之为口袋投票（pocketvoting）；如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繁荣与否作为投票标准进行投票，则称为社会投票（sociotropic voting）。当选民对个人经济状况较为满意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符合其期待时，将进行正面投票，即支持执政党候选人；反之则进行负面投票，支持在野党候选人。

Powell 和 Whitten 针对 19 个国家举行的 102 次选举进行跨国性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率提高有助于现任者获得选票，失业率升高会使现任者损失选票。^[3]美国自 1972 年至 2000 年的总统大选中，对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而进行正面评价的选民投票支持现任者较高；反之，认为经济状况恶化或经济没有重大改善者，较倾向进行负面投票而支持在野党。在共和党执政的 1972 年、1976 年、1984 年和 1992 年的总统选举中，对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肯定现任者经济表现的选民，倾向于以正面投票模式支持共和党；而不满意经济表现者，则往往进行负面投票，即较倾向投给民主党。在民主党执政的 1980 年、1996 年及 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正面评价经济状况表现而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几率明显较高；反之，不满意经济表现的选民，投给民主党候选人的几率明显偏低。^[4]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多数选民在美国第 44 届总统选举中再次进行经济投票，抛弃了执政的共和党，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当选新一届总统，这是美国总统选举十分典型的经济投票个案。

二、回顾性投票在台湾“大选” 中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从回顾性投票取向分析，选民在 1996 - 200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大选”）中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投票取向。尽管陈水扁执政四年期间台湾经济明显恶化，但在蓝绿阵营高度对决，两岸关系议题牢固主导台湾社会主要分歧线的背景下，选民因受“统独”认同和“国家”认同制约而很难进行经济投票。只有在经济因素足以实质影响选民的生活水平，并成为社会主要分歧线之一时，选民的经济投票取向才可能出现。这一现象在 2008 年“大选”中表现较为明显。

第一，经济因素对 1996 - 2004 年三次“大选”中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在台湾，影响“大选”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总体形势的好坏程度、失

业率与物价的高低、收入的增减、股市行情的涨跌幅度、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税收、财经与福利政策等。这些因素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与其他因素共同决定选民的投票行为。经济因素影响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方式和程度，与建立在西方国家选举实践基础上的经济投票理论具有较大的差别。当两岸关系议题主导选举主轴时，经济因素往往难以发挥其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常规作用，但是当经济环境恶劣到足以引起选民的高度关注，如与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两岸关系议题相提并论，甚至高于两岸关系议题时，经济因素必将发挥其影响力，选民将以符合经济投票理论的行为进行常规投票。从选民对经济情况态度的调查来看，1996 - 2004 年的三次“大选”，台湾经济整体表现的良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

1996 年以前，尽管台湾的经济增长速度已呈现下滑趋势，但失业率基本上未超过 2%，显示台湾经济整体发展相对良好（见图 1）。1996 年，台湾的经济较从前有所衰退，但在基点较高的情况下，经济的下滑并没有严重影响选民的生活水平，更没有成为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尤其是李登辉对当时政局的掌控能力较强，首次“直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又是在李一手推动下实现的，因此，选民普遍对李登辉评价较为正面。在这种背景下，影响 1996 年台湾地区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变量并非并不十分重要的经济因素，而是“李登辉情结”和以“统独”议题为核心的两岸关系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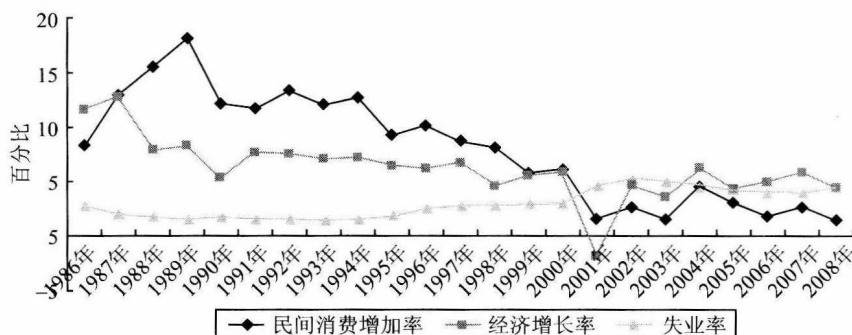


图 1 1986 - 2008 年台湾各项经济指标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经济部”网站相关数据自行整理

2000 年，选民对经济情况的评估较 1996 年时趋于恶化，但在当时“三足鼎立”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兴票案”、“李远哲挺扁事件”效应下，国民党的黑金问题以及选民的“求新、求变”心理是 2000 年“大选”时各界关注的焦点，经济议题在“大选”层次中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仍然没有

充分表现出来。

民进党执政后，尽管台湾经济发展迟滞衰退，民间投资意愿低落，消费者信心长期低迷，两岸关系高度紧张，台湾经济不断趋向边缘化；但民进党全方位操弄“民粹主义”，整个台湾社会陷入蓝绿高度对峙、国家认同分歧严重的斗争旋涡中，两岸关系议题已然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敏感议题与核心议题。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经济议题很容易被这些更易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意识形态因素所掩盖，民进党施政无能带来的经济恶化最终没能撼动民进党基本教义派的信念与热情。

2004 年“大选”时，尽管台湾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台湾民众对整体经济状况已表现出普遍不满态势，并对未来台湾经济走势非常“悲观”，但在民进党将认同议题作为选战主轴的情况下，陈水扁利用“本省人选本省人”、“爱台与卖台”、“台湾对抗中国”等激情口号煽动民粹，蓝绿阵营空前对立，导致选民的投票行为仍未大幅转移到经济投票取向上来，选民的认同态度和立场再次成为决定其投票行为的关键变量，加上“3·19 枪击案”这一突发事件，使得陈水扁侥幸连任。从表 1 可以看出，在 2004 年“大选”中，经济因素在选民投票支持陈水扁的比例中仅占 4%，位居最末，而投票支持陈水扁的前两大主要因素分别是“2·28 手护台湾活动”、“候选人比较爱台湾”，这两项因素都含有强烈的认同成分在内。

表 1 2004 年“大选”时投票支持陈水扁的主要因素

投票原因	%
2·28 手护台湾活动	29
候选人比较爱台湾	16
政绩表现	11
候选人的品格操守	10
不喜欢对手	8
喜欢候选人	7
支持政党	6
公投的议题	5
两岸政策	4
经济因素	4

资料来源：TVBS 民调中心，2004 年选举当天出口民调，<http://www.Tvbs.com.tw>

从 1996 年、2000 年、2004 年三次“大选”的结果分析，在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中，经济理性因素无法超越“统独”认同为核心的两岸关系议题对选民产生的影响力。因此，经济投票也始终没有成为选民投票的主要取向。

第二，经济因素对 2008 年“大选”中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2007 - 2008 年初，台湾经济衰退态势比以往三次“大选”前更为严重（见图 1），加上民进党高层弊案丛生，经济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在 2008 年“大选”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这既是台湾经济恶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民进党当局多年来操弄政治意识形态的必然反噬，更是台湾民众民主素质提高的必然结果。

此次选前的民调显示，与前三次“大选”不同，选民对经济开始高度关注。2007 年底，台中华征信所针对台湾五千大企业经理人所做的民调显示，72% 的经理人关注经济问题，60% 以上希望通过 2008 年“大选”换党执政来改变台湾经济问题，50% 以上的认为民进党推动的“正名”、“入联公投”、“统独”议题对经济无帮助。经理人是台湾企业界的中坚阶层，他们传达的心声很大程度反映了台湾多数中产阶级的期待。

从选举结果分析，受民进党执政不佳包袱的拖累，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继续操弄的“统独牌”、“族群牌”、“两岸牌”并没有发挥预期效应。而马英九高票当选，一方面是源于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则因民进党执政无能和严重贪腐引发了信任危机，民众转而投票支持马英九。这一选举结果说明经济因素对选民投票的影响已开始显现，这和 2007 年韩国、美国 2008 年总统选举中选民的投票行为极为雷同。

台湾《远见》杂志公布的台湾民心指数从数据上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台湾民心指数（Taiwan PublicMood Index, TPMI）包括政治信心指数和经济信心指数两类。该指数介于 0 ~ 100 分之间，指数大于 50 分代表乐观或正面评价，指数愈高显示台湾政党或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愈得民心；指数小于 50 分代表悲观或负面评价，指数愈低表示民众愈悲观愈否定，台湾政党或台湾政治、经济情况就愈失民心。从图 2 可知，自 2007 年始，台湾民心指数的三项指标都在 50 分以下，且呈现逐渐下跌趋势，2007 年底达最低点，反映了台湾民众对台湾政治、经济的信心空前低落。

2008 年初，由于受“立委”选举结果影响，台湾民心指数呈现一年来未曾有的反弹上升态势，但仍未突破 50 分。2 月，随着“立委”选举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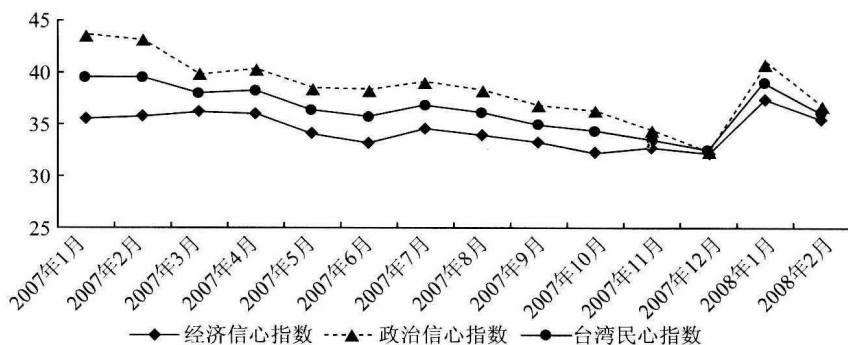


图2 2007-2008年台湾民心指数趋势

资料来源：台湾《远见》杂志民意调查中心，<http://www.gvm.com.tw/gvsrc/index.html>

力的降低，台湾民心指数再次下跌，显示2008年“大选”前，台湾民众对台湾的政治和经济信心严重受挫。在选民普遍感受经济衰退，个人经济利益受损之际，参与竞选的执政党——民进党不仅没有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竞选政见，反而继续主导认同议题，甚至借此“批蒋”、“斗马”，以清算斗争的手法操作选举，严重违背了道德、公平、正义以及人性，并进而强化了选民对“认同议题”的厌恶甚至反抗。事实上，蓝绿之间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与“台湾民族主义”之争在2005年县市长选举时即已显出疲态，2008年的两次选举，尤其是“大选”更明显地看出部分选民的经济投票优于认同投票，一般民众对于执政表现的要求超越了他们对于认同的执著。在经济环境恶化下选民的利益意识上升，压倒了动员到疲惫的“本土认同”，是民进党受挫最主要的原因。^[5]

三、竞选政见对台湾“大选” 中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所谓竞选政见，是指参与选举的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为迎合特定选民，或与竞争对手相区别，或就某一具有争议性与急迫性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政策目标或政策方向，来影响特定选民群体的投票行为。美国选举专家坎贝尔（Campbell）等人提出的传统理论认为，只有选民认知、重视候选人提出的政见，并认为这一政见与他党或其他候选人存在明显差异而更符合选民个人利益之际，选民的投票行为才会出现政见取向，但这种取向仍是在政党认同框架下作出的投票抉择，即候选人提出的政见即使满足了以上条件，也只是

构成选民政见投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还不足以确保选民会以对候选人的竞选政见认同与否来决定其投票行为。

近年来，在西方选举社会中，随着各种政治环境的冲击、选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候选人竞选策略的改变、传播媒介的发达等，尤其是选民政党认同投票取向的弱化，候选人竞选政见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日益重要。Schulman 和 Pomper、Miller、Vebb and Petrocik、Abramson 等人的研究认为，选民并不全然按照政党认同取向进行投票，政见取向对美国大选时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V. O. Key 指出，选民会先检视政府的施政表现再进行投票抉择。^[6]显然，候选人的经济竞选政见被认为是投票行为理论中影响选民投票取向的最重要因素。

在台湾地区的四次“大选”中，参与选举的候选人都会在选举初期提出如经济、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医疗等属于改革、民生类的竞选政见，但随着选情不断激化，尤其是进入白热化阶段后，这些看似理性的竞选政见很容易被边缘化，或被诸如二元对立的“政治情感”议题所替代。在台湾这种特殊的选举政治文化背景下，竞选政见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不断被其他政治因素所淹没甚至替代，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竞选政见才会发生部分作用。

1996 年“大选”中，议题立场的影响力虽然是一个显著且重要的因素，但并不像候选人因素、“李登辉情结”、政党认同等变量重要。^[7]台湾学者盛治仁就台湾《中国时报》针对 2000 年“大选”中候选人竞选政见的报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与选举相关的 4112 篇报道中，有 81.8% 的新闻并没有提及候选人的竞选政见。距离投票日仅有 2 个月之际，50% 以上的选民对候选人所提政见印象不深刻。^[8]由此看出，选民对候选人的竞选政见并非十分关注，尤其是在情绪化议题渲染下，选民很容易陷入“统独”议题等两岸关系议题的政治漩涡中，无暇顾及或很难理性思考个人或社会的经济利益以及候选人的经济政见，经济民生等竞选政见逐渐被“冷冻”。

2001 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 -2.18%，这是台湾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的状况，失业率则飙升至 5.17%，创历史新高。但善于“拼选举”的民进党成功地把民众的视线转移到“统独”议题上来，在同年年底“立委”选举中赢得第一大党位置。2004 年“大选”中，尽管陈水扁表面上提出“拼经济”、“拼改革”作为选战主轴之一，并利用一切机会向选民在社会福利、市政建设、交通设施等方面做出各种承诺，但实际上陈水扁将选举

操作成“一边一国”、“爱台与卖台”的蓝绿对决战，有关改革、经济的竞选政见迅速被政治议题所淹没，并最终被民进党完全丢弃。台湾年代民调中心针对 2004 年“大选”前选民对经济议题的看法所做调查显示，虽有 83.9% 的受访者表示应将经济议题作为竞选者第一优先的议题或政见，却有高达 60% 以上的受访者基本不了解国民党或民进党经济政见。^[9]

2008 年民进党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就是利用执政资源实施“一周一利多”政策，但这一政策真正落实的并不多，最终不了了之。而谢长廷提出所谓的“幸福台湾”、“幸福经济”竞选政见不仅空洞无物，更随着选情紧绷而从最初的“走中间理性路线”逐渐滑向“统独族群之争”的泥潭，民进党顽固操弄族群、“统独”、两岸牌，根本无暇顾及经济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在 2008 年选战中全力主打经济主轴的同时，不得不被动回应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之战。不过，与 2004 年相比，2008 年“大选”中的竞选政见议题已对选民投票行为发挥了部分作用，马英九提出的“改革与经济”和发展两岸关系议题，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了关键作用，甚至成为当选者获取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经济投票在四次“大选”中的异质性分析

在历届“大选”中，经济因素与选民投票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省籍、族群、政党认同以及两岸关系议题对选民投票取向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选民不会仅因为对经济发展或经济表现感到满意而支持执政党，也不会因为仅对经济发展或经济表现不满而支持在野党。这种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经济投票的异质性，即选民在投票时，经济发展的好坏不是决定选民支持某政党或候选人的唯一依据，而是在评估经济情况的同时，存在着其他归因因素，包括政党、族群、国家等认同因素，选民的政治成熟度和政治信任感等因素。

第一，两岸关系议题严重制约了选民的经济投票行为。经济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发挥影响力有其限定条件：一个社会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不存在起主导作用的、非经济性质的社会分歧线，即分割社会意见及团体政治倾向的主要议题，^[10]如“统独”认同、种族分歧、宗教争议等。由于这种社会分歧线往往把社会意见团体及党派分割成不同、甚至严重对立的派别，使这

些分歧在选举过程中往往比经济因素更能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

台湾是一个存在严重歧异的社会。从四次“大选”可知，两岸关系议题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社会分歧线。在这条分歧线下，认同“台湾独立”、认同中国统一或主张两岸关系维持现状之间的争论是岛内政治活动的重要议题，更是重大选举中被政党动员、炒作的主要议题。尤其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这个关系台湾未来走向的重大选举中，认同问题往往高于其他一切因素成为决定选民的投票行为的核心议题之一，选民也被这一分歧线分裂为两大政治对立的群体。

在李登辉以及陈水扁多年推动“本土”活动、培植“本土”意识，甚至进行“台独”意识灌输的影响下，岛内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持续高涨。民调显示，目前超过 60% 的民众认同“台湾主体性”，这种民意结构一度对泛蓝的基本选情造成重大冲击。当经济问题与维持台湾的“主体性”发生矛盾时，尤其是民进党 2000 年后不断将台湾“神化”或“宗教化”，提出“台湾不能输”、打一场“保卫本土政权的圣战”等宗教式的政治口号，能否维持“台湾主体性”，而不是能否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已成为选举过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甚至完全主导选情。尽管 2000 年台湾社会曾一度出现了“改革与安定”、“清廉与贪腐”的社会分歧线，但“统独”认同已经完全超越经济因素成为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主导性因素。2004 年“大选”是政治人物操弄“统独”议题的典型个案，陈水扁将“大选”操弄成“台湾对抗中国”的选战，并成功从中谋取政治私利。2008 年“大选”时，民进党的选战主轴仍为“统独”议题，借马英九外省人“原罪”攻击其对台湾的“忠诚度”、攻击马英九和萧万长的“一中市场”等，认同议题再次成为 2008 年“大选”的重要议题之一，从而淡化了部分民进党支持者对经济议题的关注。但是，与前三次“大选”不同，经济因素第一次与候选人形象、两岸关系议题同时成为 2008 年“大选”时选民投票的主要取向。

由上观之，经济分歧线（改革与安定，阶级矛盾）虽已出现，但与长期盘踞在台湾社会的两岸关系分歧线相比，经济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和明显的脆弱性，容易随两岸关系议题的发酵而失去作用。在两岸关系一直是台湾社会主导性分歧线的背景下，台湾选民很难根据经济的繁荣或衰退，评估执政党的施政绩效，进而作为投票的重要依据。

第二，蓝绿政党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导致选民在投票时容易以政党认同而不是以经济因素进行投票。西方选举中政党区别主要是民生、环保、社会

福利等经济议题，或弱势族群议题“左”或“右”的区隔，选民可以根据经济状况投票支持与自已利益接近的政党候选人。这种以经济利益为投票取向的选民，容易在不同选举中出现党际转移现象，即此次投票支持 A 党候选人，下次选举则可能支持 B 党候选人。但是，台湾的政党区隔主要在于意识形态不同，即国民党倾向于认同“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而民进党则致力于实现台湾“独立建国”、反对与大陆统一。尽管认同国民党者不一定支持中国统一，认同民进党者也不一定支持“台湾独立”，但认同国民党的选民绝大多数都反对“台湾独立”，而认同民进党的选民则多数反对两岸统一。这是选民在投票时很难支持自己所不认同政党候选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总统”选举中，“台湾前途”往往成为超越一切的重要政治议题，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代表该党对此议题表明政治立场和“统独”态度。民进党候选人往往善于利用“大选”这样的竞选机会，大力宣导并强化其追求“台湾独立”的政治立场，通过各种渠道煽动“国民党卖台、民进党爱台”的言论，积极将政党认同与“统独”认同绑在一起，使选民投票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其政党认同，而不是经济因素去选择候选人。

第三，岛内特殊政经环境容易给民进党提供掩盖执政不佳的借口。1999 年以前，台湾的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经济议题难以成为选民以及候选人关注的焦点，对选民投票抉择影响甚小。2000 年以后，台湾的经济呈现不断恶化趋势，但民进党发展经济无能，执政不佳的事实却被岛内特殊的政经环境所掩盖。

一是 2000 年“大选”后至 2004 年期间民进党尚处于初次掌握台湾执政权阶段，即便民进党在推动台湾经济方面无所建树，已被国民党统治长达 50 年之久的台湾民众在厌倦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也宁愿给民进党继续改进和“进步”的机会。二是所谓的“分立政府”（divided-government situation）为民进党推卸经济衰退的责任提供了借口。2000 - 2008 年，民进党处于少数执政状态，国民党掌握“立法院”多数，使得民进党将经济增长趋缓甚至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国民党对诸多政策和法案的杯葛，从而降低了选民对民进党的不满。三是台湾的经济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受国际整体经济环境影响显著，因此经济恶化很容易被当局归因于国际大环境的不利，岛内不少民众也持相同看法。2003 年底的一项民调显示，除 35.3% 的受访者认为台湾三年来经济不好的主因是民进党执政经验和能力不足外，第二大原因